

论中国小说东渐与朝鲜小说观念之揭橥

赵维国

摘要: 本文以高丽、朝鲜两朝的小说文献为依据,考察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创作历史实绩,探究中国小说文本、小说文体观念观照下的高丽、朝鲜早期小说观念。随着《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小说文本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朝鲜前期的士子文人始有意为小说,认知小说文体。徐居正、李承召等人承继儒家小说观念,提出了“滑稽说”“补史说”等,不仅奠定了朝鲜小说理论发展的基础,也揭橥小说文体已成为朝鲜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文体之一。

关键词: 中国小说文本东传; 中国小说观念东渐; 朝鲜早期小说观念

作者简介: 赵维国,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域外汉文文献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等。

通讯地址: 上海市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234。电子邮箱: weiguo zh999@sina.com。本课题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文化观照下的朝鲜汉文小说批评研究”[项目编号: 2017BWY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3&ZD113]、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n Analysis of Chinese Fiction's Impact on the Joseon Conception of Fict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Goryeo and Joseon fic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ancient Korean fictive work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explores the conception of early Goryeo and Joseon fiction from the lens of its reception of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fiction. With the wide spread of fictive works such as *Taiping Guangji* and *Jiandeng Xinhua*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Goryeo and Joseon scholars began to understand and consciously create fiction. Then, Seo Geojung and Yi Seungso, who inherited the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fiction, put forward the “jesting theory” and “completing history theory”. These ideas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oseon fiction theory, but also indicated that fiction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genre in Joseon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spread of Chinese fiction; spread of the conception of Chinese fiction; conception of early Joseon fiction

Author: Zhao Weiguo, Ph. D., is a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e collation and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and theatre. Address: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No. 100 Guilin Road, Shanghai 200234. Email: weiguo zh999@sina.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lanning of Shanghai (2017BWY003),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13&ZD113) 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novation Team” of Shanghai High Level Local Universities.

在韩国文学发展史上,高丽朝李奎报的《白云小说》最早以“小说”一词来命篇,但此书为诗话,并非小说意义的文学作品。直到朝鲜前期^①,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称谓始被朝鲜士子征引。朝鲜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郑麟趾等纂成《治

平要览》,上疏国王称:

徧掇旧史之录,旁采小说之文。国家兴衰与君臣之邪正、政教臧否及风俗之污隆,下而匹夫之微,外而四夷之远,

若关彝伦,则虽小而悉记;有补治体者,必录而不遗。间以诸家之释音,附以先儒之论议。广博该备,诚君上为治之大经;明白谨严,实史外传心之要典。(春秋馆史官,《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零七 21)

此笈所谓“旧史之录”“小说之文”,载录朝野异闻逸事,“虽小而悉记”,“有补治体”,这些叙述文字与汉代桓谭的小说论述颇为一致。《文选》李善注引桓谭《新论》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萧统 692)所谓“丛残小语”“短书”,即小说形态“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即小说文化功能。此论与郑麟趾“小说之文”的阐释颇为相近,义旨相类。桓谭、郑麟趾处于不同的时代与地域,两人对于小说的理解如此近同,是大智慧者识见相通,还是有学术上的传承呢?郑麟趾(1396—1478年),字伯睢,号学易斋,是朝鲜王朝初期的文臣及学者,主要著述有《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是世宗大王《训民正音》的八位编者之一,在韩国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郑麟趾熟读经史,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对于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士子。由此可以判断,郑麟趾对小说的认知显然继承了中国的小说观念,而非朝鲜小说发展实践的学术总结或他个人的独立判断。无独有偶,与郑麟趾同时代的徐居正也开始频频使用“小说”一词,他评价高丽末学者李穡作品时称“然先生之诗,虽本经史,法度森严,而亦复纵横出入于蒙庄佛老之书,以至稗官小说,博采不遗。”(徐居正,《牧隐诗精选序》178)“稗官小说”的称谓源于《汉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朝鲜王朝文献中往往以“稗官小说”称谓小说。根据笔者查阅到的朝鲜文献史料,在郑麟趾、徐居正之前,未见高丽朝士子使用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因此,笔者判断,具有小说文体意义的“小说”观念应该确立于朝鲜前期。本文以朝鲜汉文小说观念认知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高丽末至朝鲜前期的小说创作实绩,论述中国小说东渐与朝鲜小说观念确立的文化关系,客观地评判中国小说视域下的朝鲜小说观念的确立,揭示中国文化在韩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一、中国小说东渐与高丽小说观之萌兴

学界论及朝鲜小说发展时,往往以为《山海经》早在西晋或更早的时期东传到朝鲜半岛,对朝鲜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据日本学者寺岛良安《倭汉三才图会》卷十三载“应神天皇十五年,百济王遣阿直歧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二匹。”(寺岛良安 14)应神天皇十五年即太康五年(284年),以此推断《山海经》在太康五年之前已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于此时传到日本。这是中国小说东传的最早记载。又云:

时阿直歧能读经典,皇子菟道稚郎子师之读经典。天皇问曰“有胜汝之博士耶?”对曰“有,王仁者胜于我。”帝遣使于百济征王仁。翌年王仁持《千字文》来,皇子又师王仁而习典籍,莫不通达,于是儒教始行于本朝。

按《东国通鉴》曰“三韩儒教之始”当仁德天皇之朝,则与此时稍龃龉,未决。(寺岛良安 14)

据朝鲜《东国通鉴》卷四记载,宁康二年(374年),百济近肖古王时始聘高兴为博士,当时的日本为仁德天皇执政时期,是朝鲜使用汉文字载录历史的开始,徐居正《东国通鉴》称此为“三韩儒教之始”。而《倭汉三才图会》所引百济王贡奉书籍早此90年,寺岛良安以为两者相抵牾。从朝鲜、日本的文献资料来看,徐居正《东国通鉴》以为百济王聘晋人高兴为博士,是采用汉文字记录文献之始,与百济王赠送日本书籍并不矛盾。在百济设立博士之前,中国书籍已在朝鲜半岛传播,三韩人已经开始阅读汉文书籍。应神天皇皇子以王仁为师,王仁所持《千字文》并非今本《千字文》,而应该是流传于三国西晋时期的魏太尉钟繇《千字文》,曾经为王羲之所摹写,并题为《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②,是当时人们习字学习的入门书籍。此则资料是《山海经》《千字文》等中国书籍东传的最早记载。《山海经》一书被明朝人胡应麟称为“古今语怪之祖”(胡应麟 314),汉人刘歆以为“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

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祲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刘秀 4)晋人郭璞以为“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郭璞 5)但此书之“怪”似乎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朝鲜三国时代的《古记》早已亡佚,但从现存的《新罗殊异传》佚文、《三国遗事》等书籍来看,其中所载故事并未受到《山海经》的影响。朝鲜仁祖年间的著名学者李植论及此书时称“古书多怪说,文章特奇者,传后亦远,《楚辞》、《山海经》等书是也。”(李植 530)朝鲜士子仅仅把此书当作中国典籍之一,它对于朝鲜汉文小说观念的构建并没有产生主导作用。

新罗末至高丽初年,是韩国汉文小说创作的起步时期。《新罗殊异传》盖为新罗末至高丽初期作品,原书已佚。该书收录的《崔致远》(又名《双女坟记》《仙女红袋》)保存完整,语言韵散结合,故事情节宛转,是一篇较为成熟的传奇小说;其他篇目散存在类书之中,叙事简略,粗具小说梗概,尚不具备小说文体意识。根据现存的文献史料来看,高丽士子自高丽王朝中期开始渐渐接受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并开始撰述小说作品。

首先,在中国小说文本影响下,高丽著名学者李仁老(1152—1220年)、崔滋(1188—1260年)等著述了韩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笔记小说——《破闲集》《补闲集》。李仁老、崔滋是高丽王朝最为著名的学者,熟读经史子集,才华横溢,《高丽史》载录其生平事迹甚详。从小说文本内容来看,李仁老熟知中国小说。据《破闲集》卷上载:

仆尝于贵家壁上见草书两簇,烟熏屋漏,形色颇奇古。其诗云:“红叶题诗出枫城,泪痕和墨尚分明。御沟流水浑无赖,漏泄宫娥一片情。”座客皆聚首而观之,以谓唐宋时人笔,纷然未得其实,就问于仆以质之。仆徐答曰:“是仆手痕也。”(李仁老 卷上 4)

红叶题诗的故事载于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之《流红记》等。李仁老化用红叶故事来咏史,文辞典雅,人们以为此诗为中国唐宋人所作。从文本以“破闲”“补闲”命名来看,颇得传统小说命名之旨趣。

《破闲集》的命名出自李仁老的儿子李世黄的创意“而名儒韵释,工于题咏,声驰异域者代有之矣。如吾辈等苟不收录传于后世,则湮没不传决无疑矣,遂收拾中外题咏可为法者,编而次之为三卷,名之曰《破闲》。”(李仁老 跋 2)高丽王朝高宗四十一年(1254年)崔滋撰述《补闲集》,在卷末论及《国史补》《归田录》,以为《破闲集》《补闲集》等小说是在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基础上而成书的。小说发展到唐宋时期,虽然《汉书·艺文志》《隋史·经籍志》《崇文小说总目》等对小说文体的阐释文字略异,但对文体的认知近同。从传统小说观念而言,笔记体小说是唐宋小说的主要文体形态之一,宋人小说家吴处厚以为“前世小说有《北梦琐言》《酉阳杂俎》《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类甚多,近代复有《闲苑》《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吴处厚 7)与宋人小说文体认识相较,高丽士子“破闲”“补闲”等笔记小说的命名与宋人小说的“琐言”“闲苑”“闲录”一脉相承。

其次,《三国遗事》的创作者有意识地搜奇记异,并对奇异故事作了细致的理论阐释。《三国遗事》五卷,卷一卷二为《纪异》,其他各卷也多载录奇异之事。自魏晋到唐宋时期,是中国小说的起步发展时期,由于现存文本宏富,历代小说家对志怪、传奇述异的论述颇多,不胜枚举,而高丽时代的朝鲜半岛,由于保存下来的小说文本数量有限,小说家对于小说创作的缘起、小说文本内容的论述少之又少,但在《三国遗事》中,作者常常论述异事,分析故事始末,有时涉及高丽小说与中国小说的相互观照,有时涉及小说思想内涵的分析,这些内容尤显珍贵。由于《三国遗事》所收篇目较多,此处仅以《三国遗事》卷五载《金现感虎》为例。这则内容分为前后两部分。前篇叙述新罗郎君金现与虎相恋故事,后篇叙述申屠澄与虎妻故事;前篇为高丽汉文小说,后篇为唐代小说,内容相类,具体情节不同。《金现感虎》叙述虎女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而牺牲自己,金现为她“创建虎愿寺”以报“杀身成己之恩”。金现临终之际,深感此事奇异,“乃笔成传”。僧一然以为此篇是金现撰述,自己仅仅是载录者。申屠澄的故事原载于唐代薛渔思的《河东记》,今见于《太平广记》卷四二九《申屠澄》。一然所引申屠澄故事与原文略有出入。他在文末评述道:

噫!澄、现二公之接异物也,变为人妾则同矣。而赠背人诗,然后哮吼拿攫而走,与现之虎异矣。现之虎不得已而伤人,然善诱良方以救人,兽有为仁如彼者。今有人而不如兽者,何哉?详观事之始终,感人于旋绕佛寺中。天唱善恶,以自代之,传神方以救人,置精庐,讲佛戒,非徒兽之性仁者也。(一然,卷五 16—17)

僧一然在小说文本比较的基础上,以为《金现感虎》中的虎女因仁德之心而为人纪念,扬善惩恶,弘扬佛法,突出了小说的社会功能。

再次,高丽学者李齐贤以“稗说”命名其笔记为《栎翁稗说》,是朝鲜士子第一次明确地使用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稗说,在韩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李齐贤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对儒学思想的发展,还是文学诸文体的创作,均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元延祐元年(1314年)至正元年(1341年),李齐贤在元大都生活26年,与赵孟頫、虞集等交好,曾游览蒙元统治下的江南塞北,其自述道:

延祐(1316年)丙辰,予奉使祠峨眉山,道赵魏周秦之地,抵岐山之南,逾大散关,过褒城驿,登栈道入剑门,以至成都。

至治癸亥(1323年),予将如临洮,道过乾州。唐武后墓在皇华驿西北,俗谓之阿婆陵。予留诗一篇,其序云[……]。(李齐贤,卷一 3—4)

特殊的旅居元朝的社会阅历造就李齐贤成为一代大儒,他是中国文化东渐的传播者,其儒学修养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高丽学者。高丽忠惠王三年(1342年),李齐贤撰述《栎翁稗说》,其阐释“稗说”命名缘由云“稗之从卑,亦声也,以意观之,稗,禾之卑者也。余少知读书,壮而废其学,今老矣,顾喜为驳杂之文,无实而可卑,犹之稗也,故名其所录为《稗说》云。”(李齐贤,前集一 1)小说即稗说,常常和“野史”“寓言”并称,在中国文献中使用频繁,而在现存的高丽文献中,除《栎翁稗说》之外,比较少见。元代通行字书《古今韵会举

要》卷二十“稗”释语云:

《说文》:禾,别也,从禾卑声。[……]《汉志》小说谓之稗说。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又稗官,师古曰“小官也”。(黄公绍 熊忠 340—341)

元人黄公绍等认为《汉志》把小说称之为“稗说”,而《汉志》并未把小说谓之“稗说”。“稗说”一词是宋元人对小说的普遍称谓,广泛使用。南宋人赵与时《宾退录》卷八载:

《三志·甲》谓穰子、偃孙,罗前人所著稗说来示,如徐鼎臣《稽神录》、张文定公《洛阳旧闻记》、钱希白《洞微志》、张君房《乘异》、吕灌园《测幽》、张师正《述异志》、毕仲荀《幕府燕闲录》七书,多历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成,不谓之速不可也。(赵与时 89)

洪迈《三志甲》中明确地称谓徐铉《稽神录》等小说著述为“稗说”,元人字书也这样称谓,那么,在元大都生活二十余年的李齐贤使用的“稗说”概念自然源于元人通常使用的小说称谓。从他对稗说的解释来看,“驳杂之文”“无实可卑”等,较为正确地解读了小说的学术地位。

综上所述,虽然李齐贤已具备明确的小说文体概念,并以“稗说”命名其笔记,但此书成书于他回国的第二年,其中对稗说的阐释源自中国的字书及传统小说观念,而非同时代高丽士子的普遍共识。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元大都,游离于朝鲜半岛的文化环境之外,此时的他对高丽士林尚不能发挥重要作用。到了高丽末朝鲜王朝初年,随着李齐贤在国内学界声望的提高,《栎翁稗说》一书始在朝鲜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世宗大王与中国小说文本的传播

朝鲜王朝初期,是朝鲜小说观念确立的历史时期,《太平广记详节》的成书与金时习《金鳌新话》的创作,标志着朝鲜小说观念的确立。在世

宗朝之前,虽有高丽末年李齐贤《栢翁稗说》的推动,但并未引起朝鲜士子对于小说文体的关注。而到了世宗大王时期,小说文体才渐渐被士子文人所重视,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笔者以为,“小说”观念之所以于此时确立,绝非偶然,一方面是高丽朝中国小说观念东渐之后,朝鲜半岛的文人士子自觉地接受小说观念,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另一方面,世宗大王右文崇儒的文化政策,为小说发展提供了文化语境,推动了朝鲜汉文小说的发展。

在朝鲜历史上,世宗大王李裲勤奋好学,是一位最具雄才大略的国王,无论是在文化建设还是政治制度建设上,均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朝鲜史臣评述称:

王每日四鼓而起,平明受群臣朝参,然后视事,处决庶政;然后听轮对,咨访治道,引见守令拜辞者,面谕恤刑爱民之意;然后临经筵,潜心圣学,讲论古今;然后入内,燕坐读书,手不释卷,夜分乃寝。于书无所不读,凡一经耳目,终身不忘,而其读经书,则必过百遍,子史则必过三十遍,精研性理,博通古今。设集贤殿,聚儒士以备顾问。又哀集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事迹,图形纪传,系以诗赞,名曰《三纲行实》,颁诸中外,至于穷村僻巷儿童妇女,莫不观省。又自熙周之初,迄于今,以及吾东方,凡治乱兴亡可法可戒之事,广搜该载,共百五十卷,名曰《治平要览》。至于音律天文,皆所洞晓。(《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二七 39)

史料从世宗大王的学术修养、治国方略上来评述,其中不乏史臣的溢美之辞。但从他所做的具体事例来看,史官之评述基本符合历史事实。首先,世宗大王组织编纂史书《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即位之初,他认为郑道传修撰的《高丽史》讹误较多,命大提学柳观、议政府参赞卞季良等重修《高丽史》。世宗李裲从史书的实录编纂思想、编纂体例、人物臧否等方面与编纂官卞季良、郑麟趾等进行多次研讨。世宗三十一年(1449年),对重修的《高丽史》依然不满,命金宗瑞、郑麟趾等监管

修正。此书直到世宗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文宗元年(1451年)才完成。《高丽史》是研究高丽历史的重要文献,在朝鲜史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其次,为了巩固王权,编纂《治平要览》《三纲行实图》,刊行《孝行录》等,敦孝悌,厚风俗,淳化人心。世宗大王十三年,世宗大王对大臣说“三代之治,皆所以明人伦也。后世教化陵夷,百姓不亲,君臣、父子、夫妇之大伦,率皆昧于所性,而常失于薄,间有卓行高节,不为习俗所移,而耸人观听者亦多。予欲使其特异者,作为图赞,颁诸中外,庶几愚妇愚夫,皆得易以观感而兴起,则化民成俗之一道也。”(《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六五 33)此书于次年六月编成,赐书名为《三纲行实图》。再次,创造朝鲜文字,颁布《训民正音》。自西晋以来,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一尊中华制度,朝廷通行文字为汉文字。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世宗大王与郑麟趾、崔恒、成三问等制作谚文二十八字,打破了朝鲜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现状。经过三年的完善,于世宗二十八年正式颁布,诏告天下: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惘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易习,便于日用耳。(《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一三 36)

谚文颁行之后,虽遭到崔万里等大臣的反对,但在世宗大王的推行下,渐渐被朝鲜士子所接受。在世宗大王统治时期,由于世宗大王推行崇华尊儒、右文重学的文化政策,在世宗大王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博学之士。他们编纂史书、创作文学作品,为朝鲜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空前良好的文化环境。

在朝鲜世宗以前,朝鲜士子很少提及“小说”一词。而到了世宗大王时期,推重儒学,编纂各类书籍,小说文体渐渐为学者所关注。如李季甸《进治平要览笺》云“编剟旧史之录,旁采小说之文。”(23)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三月,郑麟趾进《治平要览》笺时,将此文上奏于世宗大王。在朝鲜王朝士子中,郑麟趾、李季甸等较早使用小说一词,此词语在世宗朝之前的文献中使用频率不高。到了世祖李瑈年间(1455—1468年),小说一

词已频频出现。世祖八年(1462年),成任编纂《太平广记详节》,徐居正、李承召为其书作序,将“小说”文体突出出来,引起人们对于小说文体的重视。成任,字重卿,号安斋。朝鲜王朝中期学者权鳌《海东杂录》卷三载其事迹:

昌宁人,字重卿,号安斋,念祖之子。我英庙朝登第,为人宽厚博雅,善文又能诗,得晚唐体。官至左参赞,谥文安,有集行于世。安斋七岁,从师受章句,能通文义。有同舍儿读《孝经》,公从旁默志之,退而口诵,不失一字。笔法端丽,甚可爱。光庙出内藏赵子昂书,命摹之。其笔力正逼真体,自上称赏不已,曰:“真天才也。”

安斋为文章,雄贍宏富,不事雕篆,一时高文皆出其手。

安斋尝在玉堂抄录《太平广记》五百卷,约为《详节》;又聚诸书及《太平详节》,为《太平通载》八十卷。(权鳌 47)

由于成任编撰《太平广记详节》《太平通载》,改变了徐居正对于小说的认知,推动了小说文体发展。至此之后,“小说”一词才开始在朝鲜半岛广泛使用。

从世宗朝到世祖年间(1455—1468年),小说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小说的学术地位渐渐确立。士子文人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小说文体,其实和小说文本的发展密不可分。根据笔者的考察,朝鲜前期,《太平广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小说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为人们阅读小说、研究小说提供了经典文本。《太平广记》一书虽在高丽时期已传播到朝鲜半岛,但普通的士子文人很难阅读到文本。朝鲜士子为了显示博学,常常引录其书,以此炫人。世宗二十三年五月,朝廷医官提到一味中药霹雳针,主治惊吓后精神恍惚。他引用《太平广记》称“每大雷雨后,多于野中得石,谓之雷公墨。扣之枪然,光莹如漆。又于霹雳处,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小儿佩带,皆辟惊邪;孕妇磨服,为催生药,必验。”(《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九二 28)又朝鲜世宗二十六年,世宗大王与朝臣商谈朝廷官爵设置问题,由于官员太多,在实职之外,又添设

很多虚职,屡次整顿,名目繁多,吏曹引用《唐书·职官志》《山堂考索》《太平广记》来说明这一问题。其中引证《太平广记》云:

近来又有影职之名,实与添设无异,亦将有猥滥之弊[……]《太平广记》:“白履忠请还乡,授朝散大夫。乡人曰:‘吾子家贫,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虽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实也?’履忠曰:‘虽不禄赐,且是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岂易得之也?’”本曹参详,散官所以别等级,职事所以治其任而已。我国凡军功叙劳,老人除授,必合用散官职事,除授之际,窳阙甚艰,乃除影职,名实不孚,至为未便。(《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零四 31)

在中国的朝堂上,朝廷商谈国家大事,遇到疑难问题时,往往引经据典,借鉴前朝经验,而作为小道的小说多被视作虚妄之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言,难以作为历史依据。但崇尚中华的朝鲜王廷将中国稗官小说中的故事当作经典依据,以此显示引述者通经博古。士子文人虽以《太平广记》来炫学,但此书藏在朝鲜王廷,普通士子根本没有机会阅读此书,因此,阅读《太平广记》便成为很多普通士子的理想与愿望。成任《太平广记详节》成书之后,精选五十卷篇幅,为朝鲜士子阅读《太平广记》提供了文本,推动了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随着士子文人阅读兴趣的提高,一部《太平广记》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促使爱好者搜求更多的小说文本,据文献记载,《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明代新刊的小说很快流传到朝鲜。朝鲜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明英宗正统十年),郑麟趾等编纂《龙飞御天歌》百二十五章^③,第一章叙述朝鲜太宗事,其中叙述陈抟“欲入汴州,中途闻太祖登极,大笑坠驴,曰‘天下自此定矣。’”小字注云:

《剪灯余话》曰:五代乱象,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则乱何时而已乎?图南窥其有几,有志大事,往来关洛,岂是浪游?及闻赵祖登极,坠驴大笑,故有“属猪人已著黄袍”之句。既而

拂袖归山,白云高卧,野花啼鸟,春色一般,远引高腾,不见痕迹,所谓寓大巧于至拙,藏大智于极愚,天下后世,知其为神仙而已矣,知其为隐者而已矣,孰得而窥突奥。(郑麟趾 19)

所引故事出自《剪灯余话·青城舞剑录》。《剪灯余话》成书于永乐年间,宣德八年(1433年)癸丑七月由福建建宁知县张光启刊刻,而十余年后朝鲜世宗二十七年成书的《龙飞御天歌》注文中已引用此小说,是《剪灯余话》传入朝鲜的最早记载。朝鲜世祖年间(1455—1467年),朝鲜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诗人、小说家金时习(1435—1493年)创作《题〈剪灯新话〉后》。金时习模仿《剪灯新话》之体例,创作了朝鲜历史上第一部传奇小说集《金鳌新话》,标志着朝鲜汉文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除了中国小说广为传播之外,高丽时期的笔记小说《破闲集》《补闲集》《栢翁稗说》等也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尤其是李齐贤的《栢翁稗说》,作为本土文化越来越为文人所推重。世宗十三年(1431年),世宗大王命文臣整理《栢翁稗说》,并于是年刊刻发行。金镇《栢翁稗说跋》称:

高丽益斋公,以德业文章倡于当世,所著诗文,名为《乱稿》;杂记时事,谓之《稗说》。非徒词旨典雅,前朝上下五百年之迹大略可见,实与《丽史》相为表里者也。刊行既久,未免缺误。宣德六年夏,殿下命文臣厘正缮写,刊行于江原道之原州。惟公道德之高,功业之盛,后辈所钦慕而未及见,独其英华之流及后世者,唯文章是赖耳。学者闻其风,诵其诗,必有兴起者矣。此集几至湮晦,而特命重梓,以寿其传。我殿下尊德右文之美,猗欤盛哉!(金镇 26)

李齐贤是高丽后期的文坛领袖,对世宗、世祖时期的徐居正、成伾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徐居正弟子曹伟在《笔苑杂记序》中称:

而前朝五百年间文学之士,彬彬辈

出,以遗稿传于世者,无虑数十余家,可谓人才之盛也。然记述当世朝野之事,名臣贤士之所言若行,以传于后者,罕有其人。独李学士《破闲集》、崔大尉《补闲集》,至今资诗人之谈论,为缙绅之所玩。然所论者,皆雕篆章句,其于国家经世之典,概乎其无所取也。厥后益斋李文忠公著《栢翁稗说》,虽间有滑稽之言,而祖宗世系,朝廷典故,多所记载而辨证焉,实当时之遗史也。今观座主达城相公所撰《笔苑杂记》,其规模大略与《栢翁稗说》若合符契。(徐居正,卷首序 3)

高丽虽文士辈出,但最为突出者是李齐贤,所著《栢翁稗说》在朝鲜前期开始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徐居正等阅读《栢翁稗说》中的本国前贤故事、朝廷异闻等,为稗说中前人事迹所吸引,然后承其学统,模仿《栢翁稗说》的形式,著述《笔苑杂记》等,朝鲜笔记体小说自此而盛行,成为朝鲜汉文小说创作的重要文体形式之一。

总之,中国小说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不仅为朝鲜士子提供了阅读文本,也促使他们模仿其体例,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朝鲜本土笔记小说《栢翁稗说》的重刊、《太平广记详节》的成书、刊刻,不仅开阔了朝鲜士子的阅读视野,而且为小说创作、小说研究等提供了经典文本。从徐居正、李承召等人对小说的评价来看,在世宗末至世祖朝时期,人们对于小说文体已有清晰、深刻的认知。由此可见,《太平广记详节》的刊刻、《笔苑杂记》的著述,标志着朝鲜汉文小说观念的确立。

三、朝鲜早期小说观念的文化内涵

在朝鲜文献中,有关“小说”的论述颇多,但对小说概念的阐释却比较少。在考察古代韩国小说观念时,我们发现朝鲜士子对小说概念的认知与中国士子基本相同,略微差异源自朝鲜士子个人的认知接受和文学创作实践的体悟。在朝鲜士子的小说视野里,无论是中国小说,还是朝鲜文人创作的小说,朝鲜士子评判小说文体的标准均依据传统的儒家小说观念。朝鲜王朝前期,徐居正、李承召、梁诚之、金安老等均对小说进行了评述,

代表了当时的小说观念。虽然朝鲜士子的小说观念与中国母体文化的小说观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朝鲜士子所接受的小说观念不仅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也有朝鲜士子的创作经验与文学体悟,这决定了他们对小说观念的理解有其独特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前期的很多士子对小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对小说理论贡献最大的当首推徐居正。徐居正(1420—1488年),字刚中,号四佳亭,庆尚道大丘人,是文忠公权近的外孙。据《成宗实录》卷二二三载:

居正温良简正,博涉群书,兼通风水星命之学,不喜释氏书。为文章不落古人科臼,自成一家。有《四佳集》三十卷行于世。若《东国通鉴》《舆地胜览》《历代年表》《东人诗话》《大平闲话》《笔苑杂记》《东人诗文》,皆所撰集。(《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二二三 33)

任元浚《四佳集序》评述称:

四佳徐先生,实阳村之祢甥,其得于渊源家法多矣,而与诸公齐驱并驾于一时,继宁城掌文衡,今二十有余年。先生自童丱已有能诗声,往往其佳篇警联,脍炙人口。既擢第入奎坡,奎坡群彦亦无出其右者。先生穷抵古人之妙奥,深契其理,故虽率尔寓思,信笔点缀,而动中绳墨,咳唾成珠。先生其真三昧于诗者也欤!若夫规模之大,原委乎李杜,步趣之敏,出入乎韩白,而其清新豪迈,雅丽和平,备诸家而成一大家。(任元浚 4—5)

徐居正是朝鲜学术史上最为著名的学者,其无论是在经史之学,还是诗文创作、诗学理论、小说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为了便于揭示朝鲜早期的小说理论观念,我们以徐居正作为研究中心,兼论其他人的小说阐述,尽可能细致地探究朝鲜小说文体观念的文化内涵。

首先,朝鲜初期的小说观念源自传统的儒家小说观念,以为小说是“街谈巷语之说”,有“可观之辞”。

自《汉书》确立小说家类以来,随着小说创作实践的发展,小说观念虽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史志目录奠定了小说的学术地位,即“街谈巷语之说”“小道”,有“可观之辞”。所谓“可观之辞”,体现了小说的政治文化功能,是小说传世的学术根本。中国传统诗文推崇风雅诗骚,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诗文具有教化功能,“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刘勰 40)。朝鲜士子在接受中国小说观念的时候,像中国历代文人一样,对于“可观之辞”解读首重“世教”。徐居正《细节太平广记序》中说:

及读《太平广记》,乃宋学士李昉所撰,进之太宗者也。为书总五百卷,大抵哀集稗官小说,间巷鄙语,非有关于世教,徒为滑稽之捷径耳。心窃少之。一日,在集贤殿,亡友昌宁成和仲,读之终日,屹不知倦。予举前说而告之曰:“子方有志于文章,宜沉潜六经,规矐圣贤,非圣贤之书不读可也。”和仲笑曰:“子诚确论也。然君子多识前言往行,儒有博学而不穷,能博而能约之,庸何伤乎?况张而不弛,文武不为,必皆圣贤而后读之,聘气有所未周,安能上下古今,出入贯穿,为天下之通儒乎?何子之示狭也?”(成任 1)

徐居正以为“稗官小说”是“间巷鄙语”,是非圣之书,无益于教化。而他的好友成侃批评他对于小说的理解过于狭隘,博学通儒多识,不废小说家言,这也是“世教”的具体表现。儒者只有博学多识,熔铸经史百家,方可成就文章大业。其后,徐居正不仅改变了自己对于小说的态度,而且撰写了《东国滑稽传》《笔苑杂记》等小说,以小说娱情,弘扬士大夫道德文章。与徐居正同时的李承召(1422—1484年)对小说“可观之辞”的理解更为明确,即“理之所寓”。在《略太平广记序》中论述道:

则虽街谈巷说鄙俚之甚者,皆理之所寓,必有起予之益。况于岑寂伊郁之际,得此而观之,则如与古人谈笑戏谑于一榻之上,无聊不平之气,将涣然永叙,

而足以疏荡胸怀矣,斯岂非一张一弛之道乎?不然,则稗官之职将不设于古,而小说之家亦不传于后世矣。(李承召 10)

李承召以为小说出自稗官,虽为“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但寄寓了深刻的社会道理。总之,朝鲜前期文人有关“稗官小说”的称谓及其阐释均源自中国传统小说观,突出了小说的“街谈巷语”的俗文化特质及其政治教化功能。

其次,徐居正注重小说的娱情的文学特质,提出“滑稽”说。朝鲜成宗八年(1477年),徐居正游戏翰墨,把闲暇时与朋友的戏谈之语结集,命名为《滑稽传》。他在序中称:

然子不闻善戏谑兮,文武弛张之道乎?《齐谐》志于南华,《滑稽》传于马史,居正之作是传,初非有意于传后,只欲消遣世虑,聊复尔耳!况孔圣以博弈为贤于无所用心者。(徐居正,《东国滑稽传序》23)

《齐谐》一书出自《庄子》,庄子以为“《齐谐》者,志怪者也”,未有文字流传,《滑稽列传》出自司马迁,载录齐国淳于髡、楚国优孟、秦国优旃三位奇人遗事。两书性质有所相通,突出“奇异”。《文心雕龙·谐隐》阐释“谐隐”称:

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已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衡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夫观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刘勰 21)

刘勰所述“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

稗官所采”,谐隐是滑稽的语言表现方式,目的在于运用委婉的方式批评时政,关注社会。明万历年间,陈禹谟编纂《广滑稽》三十六卷,晚于徐居正。徐居正以“滑稽”命篇,从文化渊源来看,应直接受到《滑稽列传》《文心雕龙·谐隐》的影响,也与朝鲜本土文化密切相关。笔者以为,尽管《文心雕龙·谐隐》篇论述了《滑稽列传》,以为滑稽言辞也是稗官所采,但直接影响《东国滑稽传》命名的恐怕还是韩国本土的《栎翁稗说》。李齐贤在《栎翁稗说后集序》中云:

客谓栎翁曰:“子之前所录述,祖宗世系之远,名公卿言行,颇亦载其间,而乃以滑稽之语终焉;后所录,其出入经史者无几,余皆雕篆章句而已,何其无特操耶?岂端士丈夫所宜为也。”答曰:“坎坎击鼓列于风,屣舞婆娑编乎雅。矧此录也,本以驱除闲闷,信笔而为之者,何怪夫其有戏论也,夫子以博弈者为贤于无所用心,雕篆章句比诸博弈,不犹愈乎?且不如是,不名为稗说也。”(李齐贤 1)

此序设置为主客问答的形式,灵活地阐释了作者的创作目的。李齐贤以“客”的语气提出两方面的质疑:一是《栎翁稗说前集》叙述祖宗世系、名公言论,其中不乏滑稽之语;二是士大夫文人不应该以雕篆章句游戏笔墨。栎翁的回答也是从两个方面答复:第一,闲暇时撰写的文字为了驱闲解闷,没有必要以“戏论”来责备;第二,采用孔子“博弈者为贤于无所用心”的典故,将撰述小说当作博弈游戏。《论语·阳货篇》云:“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杨伯峻 189)这句话的意思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不如博弈游戏,也远胜于什么也不做。李齐贤以圣人之言来回答“客”之质疑,以游戏之笔叙奇记异,远远胜过无所作为。李齐贤于至正元年(1341年)回国之后,因为忠烈王长期客居大都,最终逝于异乡而饱受争议,只得闭门谢客,闲居自保。他在这种情况下著述《栎翁稗说》,并以主客问答之序阐述创作宗旨。朝鲜世宗年间,《栎翁稗说》重刊,此书颇受徐居正的关注,成化十四年编纂成书的《东文选》中收录了有

关《栢翁稗说》的序跋等。徐居正博学广闻,熟知高丽后期文坛领袖李齐贤的文章著述,那么《栢翁稗说》中的“滑稽之语”应该对他影响更大。世祖八年,他为《太平广记详节》作序时,再次提及小说“徒为滑稽之捷径”,以为“圣人著书立言,足以裨名教,训后世,何尝采摭奇怪,以资好事者解颐哉?”(成任 1)也就是说,他认为小说也就是“采摭奇怪,以资好事者解颐”。在成侃、成任兄弟的影响下,他对小说的看法有所改变,不仅认识到小说补于世教的社会功能,而且明确地提出“滑稽”说。在《滑稽传序》中,徐居正模仿李齐贤《栢翁稗说后集序》的主客问答写法,阐述了小说滑稽论,并在答客语中引用“博弈者为贤于无所用心”的典故,承继李齐贤学统甚明。总之,在李齐贤小说为“滑稽之语”的影响下,徐居正明确地提出了“小说滑稽论”。

再次,小说乃补史之作。在高丽时代,崔滋《补闲集》较早地认识到小说乃补史之作,以为《国史补》《归田录》等均撰述朝廷遗事,以补史事。但小说补史之说并非肇始于《国史补》,据唐初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采撰》载: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所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编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刘知几,卷五 2—3)

又《隋志》史部杂传类释语云:

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长孙无忌 魏征 982)

史学家虽然认识到《幽明录》《搜神记》《列异传》

等荒诞虚妄,但所叙人物事迹可补正史之不足,如唐人编撰《晋书》时多得益于各类小说。在唐宋两代,由于史学繁盛,《南史》《北史》《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编纂均大量采摭小说家言,小说补史之文化功能为史学家津津乐道。成化丙午年(1486年)晚年的徐居正采录朝廷异闻,命名为《笔苑杂记》。他的侄子徐彭召序称:

而《笔苑杂记》亦其一也,盖法欧阳文忠公《归田录》,又取《国老闲谈》《东轩杂录》而为之,欲记史官之所不录,朝野之所闲谈,以备观览,其有补于来世,夫岂小哉?(徐居正,卷首序 1)

又表沿沫序称:

其所著述,皆博采吾东之事,上述祖宗神思睿知创垂之大德,下及公卿贤大夫道德言行文章政事之可为模范者,以至国家之典故,闾巷国俗,有关于世教者,国乘所不载者,备录无遗。譬如豕发骊山,珍贝尽献,犀然牛渚,光怪难逃。读之令人亹亹忘倦,盖《笔谈》谈林下之闻见,《言行录》录名臣之实,然而篇殆兼之。岂若《搜神》《杂俎》等编,摘奇抉怪,夸涉猎之广博,供谈者之戏剧而止耶!(徐居正,卷首序 2)

徐彭召、表沿沫均以为《笔苑杂记》为补史之作,与欧阳修《归田录》、王君玉《国老闲谈》(又名《国老谈苑》)、魏泰《东轩笔录》等书相类。魏泰《东轩笔录》序云“思少时力学尚友,游于公卿间,其绪言余论有补于聪明者,虽老矣,尚班班可记,因丛摭成书。呜呼,事固有善恶,然吾未尝敢致意于其间,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异时有补史氏之缺,或讥以见闻之殊者,吾皆无愧,惟览者之详否焉。”(魏泰 1)魏泰言明自己以公正的态度载录公卿事迹,以实录的笔法叙述事情始末,以待异时补史之用。总之,徐彭召、表沿沫等承继唐宋时期的“补史”观念,明确地界定朝鲜汉文小说的“补史”文化功能。

综上所述,在朝鲜王朝前期,朝鲜士子的小说观念不仅源于中国母体的小说文化接受,也是对

朝鲜王朝小说创作实践的总结。他们不仅认识到小说具有补史、有助于教化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也清楚地认识到小说的文学功能:消闲娱乐、资笑谈、广见闻。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徐居正在朝鲜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对于朝鲜小说观念的认知奠定了朝鲜小说发展的理论基础,对于后世小说的发展影响甚大,尤其是他的小说“滑稽”说,突出小说的娱乐功能,注重文字妙趣,对朝鲜假传小说、寓言小说、野谈小说的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在小说东渐的过程中,小说离开了中国母体文化语境,其学术地位则有所变化。东亚各国属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尤其是朝鲜王朝以儒家礼乐文化作为立国之本,朝鲜小说观念虽未摆脱儒家文化的制约,但“崇华”思想却大大提高了汉文小说的文化地位,为汉文小说创作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空间。随着中国小说观念、小说文本的东渐,中国小说文化直接推动了朝鲜汉文小说的创作与小说理论发展,拓展了汉文小说的创作思路,为古代朝鲜半岛的文化繁荣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注释 [Notes]

- ① 朝鲜,朝鲜半岛古代国家名称。高丽大将李成桂于1393年立国,国号“朝鲜”,1897年,朝鲜国王李熙改国号“韩国”。
- ② 今本《千字文》为梁朝周兴嗣编纂,与《三字经》《百家姓》等称为“三百千”,是儿童启蒙读物。
- ③ 朝鲜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二十六《纪年儿览》(下)载“乙丑 纂《龙飞御天歌》。命郑麟趾等纂穆祖以来肇基之迹,凡百二十五章。”参见《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455页。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郭璞《山海经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丁锡根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Guo, Pu. “Preface to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Collection of Chinese Fiction across Dynasties*. Ed. Ding Xig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6. 5–6.]

权鏊《海东杂录》卷三。东洋文库藏 朝鲜抄本。
[Gwon, Byeol. *Miscellany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Sea*. Vol. 3. Hand-copied Joseon edition.]

春秋馆史官《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朝鲜刻本,1603年。
[Historiographer of Spring and Autumn Museum.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Joseon Dynasty: Veritable Records of Sejong. Joseon edition in 1603.]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朝鲜刻本,1603年。
[———.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Joseon Dynasty: Veritable Records of Seongjong*. Joseon edition in 160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Hu, Yinglin. *Collected Jottings from the Cottage on Mount Shaoshi: Corrections on the Four Categories (2)*.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黄公绍 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Huang, Gongshao, and Xiong Zhong. *The Essentials of Ancient and Modern Rhyme*. Vol. 20.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李植《泽堂别集》卷一五,《韩国文集丛刊》第88册,财团法人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I, Sik. *An Anthology of Taekdang’s Works*. Vol. 15. *Korean Literary Collection*. Vol. 88. Ed. National Culture Promotion Committee. Seoul: Kyungin Publishing, 1996.]

一然《三国遗事》(影印版)。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73年。
[Il-yeon. *Memorabilia of the Three Kingdoms* (Photocopy). Seoul: National Culture Promotion Committee, 1973.]

任元浚《四佳集序》。徐居正《四佳集》。朝鲜全州:徐文裕刻本,肃宗31年。第4—5页。
[Im, Wonjun. “Preface.” *Seo Geojung. Four Best Collections*. Edition in 1705. 4—5.]

郑麟趾《龙飞御天歌》卷十。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藏,朝鲜刻本。
[Jeong, In-ji. *Songs of the Dragons Flying to Heaven*. Vol. 10. Joseon edition in Osaka Prefectural Central Library.]

金镇《栢翁稗说跋》,《东文选》卷一〇三,徐居正编。首尔: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26页。
[Kim, Pin. “Postscript to *Unofficial Records of Yeogong*.” *Selected Eastern Essays*. Vol. 103. Ed. Seo Geojung. Seoul: Ancient Joseon Book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4. 26.]

李季甸《进治平要览笺》,《东文选》卷四四,徐居正编。首尔: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23页。
[Lee, Gye-jeon. “Note for the Submitted *Exemplar for Efficient Government*.” *Selected Eastern Essays*. Vol. 44. Ed. Seo Geojung. Seoul: Ancient Joseon Book

-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4. 23.]
- 李仁老 《破闲集》。朝鲜钞本。
- [Lee, Inro. *Collection of Leisure*. Hand-copied Joseon edition.]
- 刘勰 《文心雕龙》。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 [Liu, Xie.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 刘秀 《上山海经奏》,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丁锡根编。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4 页。
- [Liu, Xiu. "Report about the Submitted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Collection of Chinese Fiction across Dynasties*. Ed. Ding Xig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6. 4.]
- 刘知几 《史通》, 《四部丛刊初编》, 张元济主编。上海: 商务印书馆缩印, 1936 年。
- [Liu, Zhiji. "General History." *A First Edition of The Four Categories of Books*. Ed. Zhang Yuanji.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6.]
- 徐居正 《牧隐诗精选序》, 《韩国文集丛刊》第 5 册, 财团法人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首尔: 景仁文化社, 1996 年。第 178 页。
- [Seo, Geojung. "Preface to Selection of Mogeun's Poetry." *Korean Literary Collection*. Vol. 5. Ed. National Culture Promotion Committee. Seoul: Kyungin Publishing, 1996. 178.]
- : 《东国滑稽传序》, 《古今笑丛》, 柴贵善等译注。首尔: 韩国文化社, 1998 年。第 23 页。
- [— — — . "Preface to *Biography of Jesters in the East Country*." *Assorted Collection of Ancient Humor*. Trans. and eds. Si Kwi-sun, et al. Seoul: Hankook Publishing House, 1998. 23]
- : 《笔苑杂记》。朝鲜清风郡: 徐贞履刊本, 崇祯 14 年(1641)。
- [— — — . *Miscellaneous Notes*. Edition in 1641.]
- 成任 《太平广记详节》。首尔: 学古房影印, 2005 年。
- [Seong, Im. *Comprehensive Records of the Taiping Era: A Selection*. Seoul: Hakkobang, 2005.]
- 寺岛良安 《倭汉三才图会》卷一三。东京: 日本随笔大成刊行会, 1928 年。
- [Terajima, Ryōan. *Illustrated Sino-Japanese Encyclopedia*. Vol. 13. Tokyo: Nihon Zuihitsu Taisei Publishing, 1928.]
- 魏泰 《东轩笔录》。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
- [Wei, Tai. *Notes of East Studi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吴处厚 《青箱杂记》。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年。
- [Wu, Chuohou. *Notes of Green Box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萧统 《文选》。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 [Xiao, Tong. *Literary Selectio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59.]
- 杨伯峻 《论语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
- [Yang, Bojun. *Analects of Confucius: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李齐贤 《栎翁稗说》(影印版)。东京: 日本成蹊堂丛书, 1913 年。
- [Yi, Jeh-yeon. *Unofficial Records of Yeogong*. Tokyo: Seikidō Library, 1913.]
- 李承召 《三滩集》卷一〇。东洋文库藏清州刻本, 嘉靖乙未(1535 年)。
- [Yi, Seungso. *Collected Works of Samtan*. Vol. 10. Edition in 1535.]
- 赵与时 《宾退录》卷八, 《丛书集成初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年。
- [Zhao, Yushi. "Records after the Guests Retired." Vol. 8. *Collected Collectanea, 1st Se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长孙无忌 魏征 《隋书·经籍志》。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年。
- [Zhangsun, Wuji, and Wei Zheng. *The Book of Sui: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责任编辑: 程华平)